

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

白重恩 钱震杰

摘 要: 以 2004 年经济普查后修订的资金流量表为基础, 分析 1992—2005 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 可以发现: 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 1996 年达到最高, 此后逐年降低, 截至 2005 年, 总共下降了 12.72 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阶段, 居民部门下降了 10.71 个百分点, 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 7.49 个和 3.21 个百分点; 在再分配阶段, 居民和企业部门分别下降了 2.01 和 1.16 个百分点, 政府部门则上升了 3.17 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 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 分别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 5.99 个和 3.21 个百分点。在 2005—2007 年间, 受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的影响, 居民部门进一步下降了 3 个百分点。

关键词: 国民收入 初次分配 再分配 资金流量表

作者白重恩, 经济学博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 100084); 钱震杰, 经济学博士,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 (北京 100084)。

一、引 言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企业、政府、居民等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关系。由于企业、政府和居民三个部门在消费、投资或储蓄等领域有不同的行为模式, 它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化显然会使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发生变化, 故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近十年来,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居民部门的比重逐年下降, 而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占比逐年上升。^① 许多研究者认为,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这一变化是导致我国多年

* 本研究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基金号: 70625002) 支持。下载本文数据请至 <http://www.nifs.org.cn/news.php?classid=58>。

①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 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 年第 6 期。

②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李扬: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调整》,《中国证券报》2007 年 10 月 22 日。汪玉凯:《应重视收入分配的结构失调》,《学习时报》2006 年 8 月 21 日。Louis Kuijs, 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World Bank China Off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 May 5, 2006。汪同三:《改革收入分配体系解决投资消费失调》,《中国证券报》2007 年 10 月 29 日。谢伏瞻:《提高消费率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发言, <http://www.chinanews.com.cn/cj/news/2007/03-17/893861.shtml>。

来投资比重过高, 消费低迷的原因。^② 与此同时, 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明确提出要提高国民收入中居民部门的占比。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随着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政策出台,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话题再一次被推到了政策讨论的前沿。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是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问题, 但对这一事实的认定却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直接比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政府税收以及企业利润的增速与 GDP 增速的关系;^① 另外,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曾利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测算居民部门收入占比。^② 但这两种方法无法全面反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也无法分析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而资金流量表则分别报告了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取得的可支配收入,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以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原因。

尽管资金流量表的研究价值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③ 但利用资金流量表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文献并不多。许宪春首次利用资金流量表计算了我国 1992—1997 年间的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间的分配。^④ 李扬和殷剑峰利用 1992—2003 年的资金流量表, 讨论了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各种收入来源的变化对各部门收入占比的影响, 并指出在 1992—2003 年间, 居民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比重下降的原因是初次分配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和财产收入比重有所下降。^⑤ 相比之下, 本文与李扬和殷剑峰一文关心的问题最为接近, 与该文相比, 本文有以下几点不同。

首先, 李扬和殷剑峰一文直接采用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⑥ 但国家统计局在编制资金流量表时, 假设劳动者报酬的增长率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相同, 用以推算每年的劳动者报酬。^⑦ 在劳动者报酬下降较快的时期,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较慢, 会高估资金流量表中的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并低估其下降幅度; 同时, 由于经济普查年份数据直接取自普查数据, 而非普查年份部分数据通过估算得到, 资金流量表中 2003—2005 年的劳动报酬占比、生产税净额占比以及企业、居民和政府的收入占比均有很大幅度的波动。如果直接利用资金流量表, 既不能反映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居民和政府部门收入占比的准确水平, 也无法取得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确切趋势。我们利用 1993—2007 年的省

① 许多财经类新闻刊物采用这种方法, 另外陈志武也曾采用这一方法, 参见陈志武:《为什么百姓收入赶不上 GDP 增长》,《国际融资》2008 年第 9 期。

② 国家发改委:《2006 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7 年 2 月 1 日, 转引自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5352697.html>。

③ 参见贝多广、骆峰:《资金流量分析方法的发展和应用》,《经济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④ 许宪春:《中国资金流量分析》,《金融研究》2002 年第 9 期。

⑤ 参见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 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 年第 6 期。

⑥ 参见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 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 年第 6 期。

⑦ 需要说明的是, 李扬和殷剑峰采用了 2004 年经济普查前的资金流量表, 而本文则采用 2004 年经济普查之后调整过的资金流量表。不过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的资金流量表, 其劳动者报酬的估计都采用这种思路, 只不过 2004 年经济普查后调整时, 采用 2004 年普查得到的劳动者报酬作为基数。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年。

际GDP收入法核算数据和《中国财政年鉴》(下文简称财政年鉴)中的数据,调整了资金流量表的要素分配份额,利用原资金流量表中各要素收入在不同机构部门间的分配比例,重新计算1993—2005年间各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各项收入,并将其推算到2006年和2007年。最后利用调整后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再分配中的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和福利以及社会补助等项目,计算了各部门可支配收入。通过这一调整,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测算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间的分配格局,以及各部门收入占比在期间的变化幅度。

其次,李扬和殷剑峰一文对各部门初次分配收入构成和变化原因的分析存在问题。比如,他们将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分为居民部门增加值、政府和企业部门向其支付的劳动者报酬,以及财产收入净值的总和,在计算劳动者报酬占居民部门收入比例时只包括了政府和企业部门向其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而没有包括居民部门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这样各部门收入变化的原因就不能得到准确的反映(详见李扬和殷剑峰一文中表5及其相关讨论)。^①本文按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将增加值分成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生产税净额,再将其中资本收入分成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每个部门根据其在生产活动中提供的要素,取得相应的要素收入,构成所谓的延伸功能性分配(Extended Functional Distribution)。因此,各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应由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经营性留存和生产税净额中的一项或几项构成,这样能够更准确地测算出不同类型的收入变化对初次分配中各部门收入占比变化的贡献。

最后,在定量结论方面,虽然我们的研究支持了李扬和殷剑峰一文的主要结论,即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阶段,主要来源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和财产收入占比下降,但是由于我们对资金流量表数据的调整,以及对各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构成的准确测算,我们得到不同的定量结果。一是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事实。根据调整结果,到2005年底居民、政府和企业部门占比分别为54.12%、21.75%和24.13%,而且在多数年份政府部门的占比都低于企业部门,而直接利用资金流量表,李扬和殷剑峰一文得到了政府部门收入占比一直高于企业部门的结论。二是对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原因的定量分析方面。我们的测算表明,1996—2005年期间,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了10.71个百分点,同期企业和政府部门分别提高了7.49个和3.21个百分点;^②通过再分配,居民部门进一步下降2个百分点,企业部门下降了1.1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相应上升了3.17个百分点。总地看来,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贡献各占一半。本文对2006年和2007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推算表明,受政府部门生产税净额上升较快的影响,最近两年居民部门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资金流量表的构成,特别是资金流量表所反映的初次分配的过程,并报告了资金流量表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果;第三部分讨论了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质量,指出资金流量表中的要素分配份额数据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利用省际收入法GDP数据和财政年鉴数据,调整了资金流量表中的要素分配份额,并利用资金流量表中关于各要素在各部门间分配的比例,重新计算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第五部分利用调整后的数据,讨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1996—2005年间的变化情况和原因,以及2005年到2007年三年

① 参见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② 住户部门是国民经济核算中采用的提法,在我国包括城镇和乡村居民,也包括个体户。在本文中,如无特别说明,“住户部门”和“居民部门”将互换使用,企业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部门。为简化讨论,本文将忽略国外部门,同时也忽略与之相关的进出口净额。

间的变化。第六部分总结。

二、资金流量表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前提是取得企业、政府和居民三个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额。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资金流量表是唯一直接报告这三个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源。^①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金流量表记录了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和国外部门等五大部门间的收支情况。^②资金流量表采用矩阵结构,主栏列出交易项目,宾栏列出各机构部门,而每个机构部门下再列出两个分栏,分别反映该机构部门的资金流入和流出,称为“来源”(source)和“运用”(use)。^③通过这种结构,资金流量表一方面记录了各机构部门以增加值为起点,经过初次分配,形成初次分配总收入,之后经过再分配形成可支配收入的过程;另一方面还反映了初次分配中各种要素收入,以及再分配阶段各种转移支付项目在部门间的分配情况,故可用来分析国民收入份额分配格局及其变化原因。

(一) 资金流量表中的初次分配

对一个机构而言,初次分配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因向其他机构提供生产要素,取得劳动者报酬或财产收入等要素报酬,或按法律规定取得生产税净额;另一方面是各机构以其增加值为起点,向为其提供生产要素的其他机构支付劳动者报酬或财产收入等要素成本,并按规定在生产过程中缴纳生产税和取得生产性补贴。因此,各机构的初次分配收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增加值剔除向其他机构支付的要素成本以及缴纳生产税净额后的余额(在本文中将其称为“经营性留存”);二是该机构凭借其向其他机构提供要素而取得的要素收入,或者按规定收取的生产税净额。在资金流量表中,各机构增加值以及初次分配中各项支出或收入都加总记录在所属部门的对应项目中,由于不同部门的经济活动特点不同,各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实际上由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中的一项或几项构成。表 1 给出了各部门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收入来源及计算方法。

企业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有两项内容:一是财产收入,包括其存款和持有其他证券带来的利息收入,以及从上市公司红利中取得的分红;二是增加值中剔除生产成本(包括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性支出)和生产税净额后的余额,这是企业部门从其创造的增加值中取得的收入,即“经营性留存”。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的初次分配收入来源类似,本文将它们合并为“企业部门”。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机构的利息收入和支出主要来自金融中介活动,仅有极少部分是金融部门自有财产收支,如果将中介活动发生的利息也记在金融部门的财产收入中,不仅会错误估计金融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来源的构成,^④也会错误估计财产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⑤因此金融机构的财产收入项目需要进行专门的

①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提到的资金流量表均指资金流量表的实物部分。

② “住户部门”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提法,在本文中同“居民部门”。

③ 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

④ 利用资金流量表报告的数据计算,金融机构的增加值剔除该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财产支出后,总是得到负的经营性留存,这显然并不合理。

⑤ 资金流量表将金融中介产生的利息收入重复计入财产性收入,从而高估了财产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值。事实上,直接利用资金流量表中国内合计的财产收入数据计算,发现财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值在历年都高达 10% 以上,与我国欠发达的资本市场显然不相称。

调整。^①

政府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包括三项内容：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包括存款利息收入和国家持有的 A 股不可流通股本产生的红利），以及其增加值剔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以及贷款利息和国债利息等支出的余项，即政府部门的“经营性留存”。

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劳动者报酬，分别来自企业和政府部门向居民支付的劳动报酬，以及居民部门内部的劳务关系产生的劳动报酬，例如个体经营者向其雇员支付的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收入，主要是居民存款和持有国债取得的利息，以及按其持有的 A 股流通股比例取得的红利；三是居民部门增加值中剔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贷款产生的利息支出的余额，即为居民部门的“经营性留存”。^②

表 1 各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来源简表

收入来源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劳动者报酬	无	无	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无	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增加值中的生产税净额	无
财产收入	企业存款和持有的非股票证券取得的利息 企业持有 A 股取得的上市公司分红	政府部门存款取得的利息 政府持有 A 股非流通股取得的分红	住户存款和持有非股票证券取得的利息 住户持有 A 股取得的上市公司分红
经营性留存	= 增加值 — 向住户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 — 向政府部门缴纳的生产税净额 — 由贷款和企业债券产生的利息 — 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分红	= 增加值 — 向住户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 — 向本部门缴纳的生产税净额 — 由贷款和国债产生的利息	= 增加值 — 向本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 — 向政府部门缴纳的生产税净额 — 由贷款产生的利息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编制。

注：企业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的财产收入还包括投保人取得的保险投资收益；企业部门经营性留存还剔除了金融机构向投保人支付的投资分红，其数值相对较小，故未在表中列出。

显然，资金流量表一方面给出了各部门初次分配收入的来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初次分配中各要素收入（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 and 经营性留存，其中后两项为资本收入）在各机构间的分配情况。若用 i 表示收入类别（ i =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经营性留存）， j 表示部门类型（ j = 企业、政府、住户）。则部门 j 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占比（用 a_i 表示）等于 j 部门在各类收入中的占比（ b_{ij} ）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类收入在全国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占比（用 c_i 表示）。于是，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可以分别用式（1）、（2）、（3）表示：

$$a_{\text{企业}} = \sum_{i=\text{财产收入、经营性留存}} b_{i \text{ 企业}} \cdot c_i$$

(1)

$$a_{\text{政府}} = \sum_{i=\text{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经营性留存}} b_{i \text{ 政府}} \cdot c_i$$

(2)

① 调整的办法是，首先用金融部门利息收支的净额替代该部门利息项目的数据（净额为正，记入利息“来源”方，否则记入利息“运用”方），再将其与原资金流量表中的红利和其他财产收入结合，得到调整后的该部门的财产收入。同时，也需相应地调整资金流量表国内合计项中的财产收入数据。

② 由于居民部门包括城镇农村居民和个体经济，其增加值包括个体经济、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居民自有住房等形成的增加值，其中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收入的相对比例完全取决于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规定。

$$a_{\text{住户}} = \sum_{i=\text{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经营性留存}} b_{i, \text{住户}} \cdot c_i \tag{3}$$

其中，对任何类型的要素收入*i*，我们有 $b_{i, \text{企业}} + b_{i, \text{政府}} + b_{i, \text{居民}} = 1$ 。由此看来，初次分配中的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 c_i ）和要素收入在各部门间分配的变化（ b_{ij} ）将同时影响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各部门的收入占比（ a_j ）。

利用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8》报告的 1992—2005 年资金流量表的实物交易部分，我们计算了 1992—2005 年间的 b_{ij} 和 c_i 。在 1992 年到 2004 年间，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下降，但在 2005 年有所上升；生产税净额占比在 1996 年前较稳定，之后逐渐上升，但在 2004 年又突然下降，2005 年突然回升；财产收入份额在 1998 年前平均为 8% 左右，之后则骤降至 6% 左右；经营性留存（ $c_{\text{经营性留存}}$ ）则在 1998 年后呈上升趋势，但在 2005 年突然下降（见表 2）。

表 2 1992—2005 年全国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分类构成（ c_i ）和各类要素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 b_{ij} ）

年份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财产收入				经营性留存			
	c_i	住户 (b_i 住户)	c_i	政府 (b_i 政府)	c_i	企业 (b_i 企业)	政府 (b_i 政府)	住户 (b_i 住户)	c_i	企业 (b_i 企业)	政府 (b_i 政府)	住户 (b_i 住户)
1992	0 546	100%	0 1450	100%	0 084	43 61%	3 53%	52 86%	0 226	60. 80%	7 82%	31 37%
1993	0 515	100%	0 1565	100%	0 093	41 62%	3 77%	54 61%	0 235	69. 09%	5 50%	25 41%
1994	0 524	100%	0 1558	100%	0 102	39 66%	3 86%	56 48%	0 218	62. 90%	5 08%	32 02%
1995	0 536	100%	0 1421	100%	0 084	37 45%	3 18%	59 37%	0 238	68. 99%	3 11%	27 90%
1996	0 529	100%	0 1525	100%	0 087	36 40%	2 88%	60 72%	0 232	59. 22%	4 83%	35 95%
1997	0 536	100%	0 1577	100%	0 077	41 72%	2 42%	55 86%	0 229	59. 85%	4 94%	35 29%
1998	0 534	100%	0 1668	100%	0 081	42 58%	3 72%	53 70%	0 218	58. 36%	3 48%	38 16%
1999	0 533	100%	0 1650	100%	0 059	38 24%	3 26%	58 50%	0 243	63. 91%	1 86%	34 22%
2000	0 510	100%	0 1651	100%	0 059	41 51%	4 16%	54 33%	0 266	62. 15%	3 37%	34 48%
2001	0 503	100%	0 1710	100%	0 058	42 26%	4 61%	53 13%	0 268	66. 27%	4 22%	29 51%
2002	0 509	100%	0 1736	100%	0 060	43 23%	4 59%	52 18%	0 257	68. 99%	5 87%	25 17%
2003	0 494	100%	0 1736	100%	0 063	49 84%	5 25%	44 91%	0 269	66. 13%	6 23%	27 64%
2004	0 472	100%	0 1496	100%	0 062	51 40%	6 08%	42 53%	0 317	71. 95%	3 17%	24 88%
2005	0 504	100%	0 1616	100%	0 066	57 53%	4 63%	37 84%	0 268	71. 35%	3 75%	24 90%

数据来源：1992—2004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2005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年）。

注：财产收入是资金流量表中各部门财产收入的来源项，企业部门是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合并结果，在合并前金融机构部门的财产收入剔除了重复计算的金融中介利息。经营性留存为该部门增加值剔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财产收入的运用项后的余额。

根据表 2，生产税净额和劳动者报酬分别由政府 and 住户部门取得（ $b_{\text{生产税净额, 政府}} = 1$ ， $b_{\text{劳动者报酬, 居民}} = 1$ ），故生产税净额和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变化 1 比 1 地影响 $a_{\text{政府}}$ 或 $a_{\text{住户}}$ 。在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中，政府所分得的比例都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财产收入中，住户部门的占比在 1992—1996 年期间逐年上升，在 1996 年达到 60% 的最高水平，但之后则逐年下降，到 2005 年已经下降到 37. 84%，与之对应，财产收入中企业部门取得的比例则先下降后上升。在经营性留存中，企业部门所占比例都在 60% 以上，且近年来逐年上升，到 2004 年已达到 70% 以上。总地看来，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资本收入（包括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分别是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

（二）资金流量表中的再分配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各部门初次分配收入为起点，经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或福利、社会补助，以及其他经常性转移等再分配项目，形成可支配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编

制说明，其他经常性转移的项目构成比较复杂，包括保险赔付和国内外之间的经常转移，在企业 and 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中，该项比重波动较大，故我们在后续分析中将忽略这一项。^① 由于忽略国内外部门间的经常性转移，本文中的可支配收入总额等于初次分配总收入，与资金流量表仅有微小出入，但不会对我们的定量结论有明显的影响。

收入税是企业 and 居民部门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中的介绍，收入税的数值取自财政年鉴中的企业所得税和居民所得税。^② 在实际操作中，社保缴费包括企业和个人缴款两部分，但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社保缴费在初次分配阶段被计为劳动者报酬，而在再分配阶段，将企业和个人缴款的总和计入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缴纳的社保缴款中。社保福利是政府向居民的转移。在资金流量表中社保缴费和福利数据都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及累计结余”表。由于居民社保缴款一直高于政府社保福利支出，故社会保险部分表现为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的净转移。社会补助是政府和企业部门对住户进行的转移支付，以政府部门支出为主。

为反映转移支付的变化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表 3 中给出了政府取得的收入税、社保净收入，以及居民取得的社会补助等资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其中，政府取得的所得税收入、社保净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逐年增加，居民取得的社会补助的比重在近年来仅微弱上升，但仍远低于 1990 年代初期。

表 3 1992—2007 年主要再分配项目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

年份	收入税		社保净收入	社保补助	年份	收入税		社保净收入	社保补助
	居民和企业	居民				居民和企业	居民		
1992	3 79	0 02	0 19	1 67	2000	2 12	0 67	0 26	0 31
1993	2 54	0 08	0 12	1 26	2001	2 84	0 91	0 32	0 71
1994	1 48	0 15	0 13	1 04	2002	2 81	1 01	0 48	0 90
1995	1 46	0 22	0 21	1 05	2003	2 99	1 04	0 64	0 40
1996	1 41	0 27	0 24	0 94	2004	3 05	1 09	0 72	0 39
1997	1 51	0 33	0 15	1 00	2005	3 52	1 14	0 86	0 43
1998	1 42	0 40	— 0 02	1 15	2006	3 78	1 16	1 02	0 46
1999	1 59	0 46	0 12	0 29	2007	4 00	1 28	1 17	0 48

数据来源：1992—2005 年数据来源同表 2；2006—2007 年数据为作者根据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计算，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民收入用 GDP 代替，收入税为政府部门收入税收入，社保净收入为政府部门社保缴费和社保福利支出的余额，社保补助为居民部门的来源项。

在图 1 中，我们比较了初次分配和可支配收入中的各部门收入占比，左边两幅图反映了初次分配中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收入比重，而右边两幅图是再分配后的结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一直最高，它从 1992 年开始上升，在 1996 年达到最高之后持续下降，2004 年下降到最低点。这一期间，企业部门占比的变化与居民部门正好相反。相比之下，政府部门收入占比最低，且在 1992—2005 年间波动较大。值得注意的是，三个部门的收入占比在 2004 年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后，在 2005 年又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使得 2003—2005 年的数

① 本文关于资金流量表编制情况的介绍，如无特别说明，都来自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和 2008 年出版的《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但经比较后我们发现，资金流量表中企业收入税比财政年鉴中报告的少。考虑到两者误差不大，在本文仍采用了资金流量表的数据。

值呈现出较大的波动。

在再分配阶段，政府取得的收入税、社保净付款的比重上升，而支付的社保补助又有所减少，故经过再分配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已超过企业部门，而且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在 1996—2003 年间的增幅很大。另外，与初次分配的结果相比，再分配之后的住户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无明显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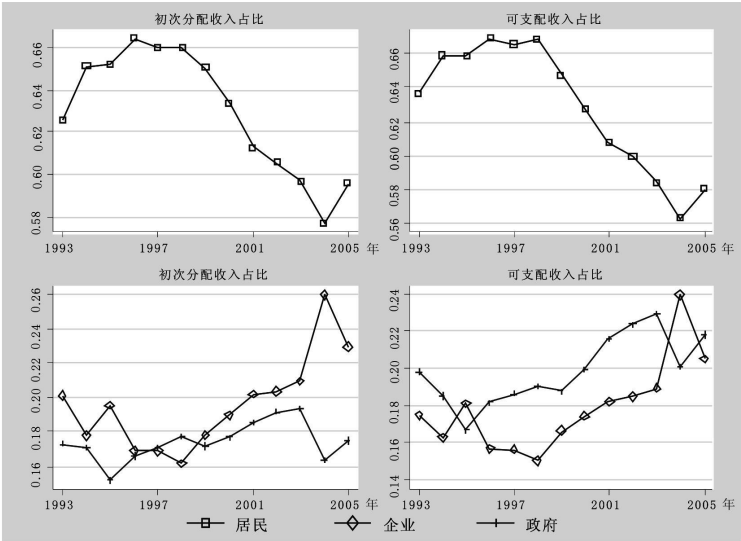


图 1 资金流量表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果

数据来源：同表 2。

三、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质量

在编制资金流量表时，国家统计局利用了各种可能的统计资料，并进行了一些假设和数据处理。^① 但这些处理很可能影响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质量，图 1 中 2003—2005 年间的波动就很可能与此有关。探讨资金流量表数据质量的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看能否找到其他渠道的数据支持或质疑资金流量表所反映的信息。本节从要素分配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依次考察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质量。

（一）要素分配份额

资金流量表反映了初次分配阶段 GDP 按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划分的要素分配。与收入法 GDP 的要素分类相比，区别仅在于它们对资本收入的划分，在资金流量表中资本收入被分为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而收入法 GDP 中则将其分为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在理论上，资金流量表中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资本收入在 GDP 中的占比应与收入法 GDP 相同。

在图 2 中，我们分别给出了用资金流量表、省际收入法 GDP 数据计算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

① 关于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可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该书的附录给出了非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另外，国家统计局在 2008 年修订并出版了 1992—2004 年的资金流量表，关于这次修订的所有方法和假设可以参考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

税净额在 GDP 中的占比。我们还用《中国财政年鉴》公布的历年“各项税收”，加上财政主要收入项目表中的“征收的排污费”、“教育费附加”和“其他收入”以及政府预算外收入，再减去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并扣除由于国家控制价格向粮食、煤炭、有色金属、农垦企业支付的企业亏损补贴后，得到生产税净额的代理值，计算了《中国财政年鉴》反映的生产税净额在 GDP 中的比重，并绘制在图 2 的右半部分中。^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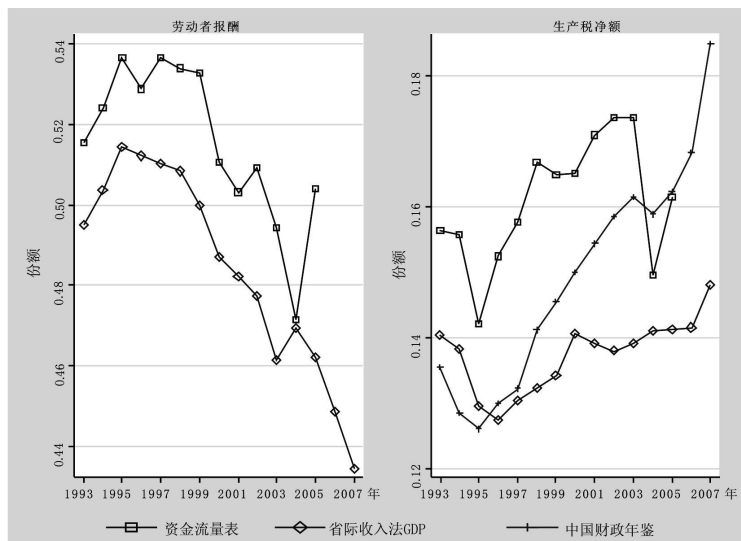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数据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占比

“资金流量表”数据利用资金流量表计算，来源同表 2。“省际收入法 GDP”中，1993—2004 年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年；2005—2007 年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的生产税净额根据文中介绍计算，计算所采用的原始数据，1993—1997 年取自 2000 年《中国财政年鉴》第 457 页；1998—2007 年取自 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第 456 页。

图 2 的左半部分是用资金流量表和收入法 GDP 数据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根据白重恩和钱震杰的研究，^② 国家统计局从 2004 年改变了个体经营者收入的核算方法，为与 2003 年及以前年度可比，图 2 中 2004 年及以后的劳动者报酬进行了与该文类似的调增。^③ 国家统计局在编制资金流量表时，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代替劳动者报酬的增长率，并以 2004 年劳动者报酬为基数推算非普查年份的劳动者报酬，故无需对其进行调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包括劳动者报酬，还有财产收入和其他经营性留存。1995 年以来，GDP 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较快，但构成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其他组成部分下降的幅度则相对较小或没有下降（见表 2），因此国家统计局的方法高估了非普查年份的劳动者报酬。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资金流量表数据得到的劳动收入份额总是高于省际收入法 GDP 数据，同时在 2003—2005 年之间表现出较大的波动。鉴于此，省际收入法 GDP 数据更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年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实际变化趋势。

图 2 的右半部分是生产税净额在 GDP 中的占比。财政年鉴数据与资金流量表数据在 2003 年之前都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因此两者在这段时期的差距也基本保持不变。在编制资金流量表

① 考虑到政府支付的企业亏损补贴属于负的所得税，我们将这部分支出抵扣了企业所得税收入。《中国财政年鉴 2000》，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2000 年。

② 白重恩和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③ 调整需要个体经济的经营收入，该值 2005—2007 年无公开数据，调整时假设其 2005—2007 年的增长率与个体经济从业人口的速度相同。

中的生产税净额时，国家统计局同时利用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各种可得数据，严格按部门分别计算生产税净额，在数据质量较高的经济普查年份，这种方法可得到很准确的结果，但在非普查年份，受统计范围变化和资料的限制，可能得到与普查年份差异较大的结果。^①因此资金流量表中的生产税净额在 2003—2005 年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 GDP 核算方法相关资料，收入法 GDP 数据是各省根据企业统计数据加总得到的，一些具有间接税特点的非税收入（例如某些预算外收入）则无法得以反映，因此收入法 GDP 数据很可能低估了生产税净额在 GDP 中的占比，其水平和增幅都低于资金流量表和财政年鉴数据计算的结果。综合两方面来看，财政年鉴数据计算的生产税净额可能比其他两个数据来源更为准确。

在表 2 中，财产收入占比在 1994 年最高，1994—1999 年期间持续下降，之后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考虑到财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利息，我们计算了 1992—2005 年期间定期存款年终余额与 GDP 的比值用来代表存款水平，还计算了平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结果发现，前者在这一时期持续上升，而后的变化轨迹与财产收入占比非常一致。因此，1999 年以来财产收入占比比较低的事实，实际上是同一时期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后果。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在要素分配中，资金流量表反映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信息不准确。考虑到这两项分别是居民和政府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其核算误差也会反映到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中，因此首先要找到资金流量表以外其他反映上述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额的资料。

利用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将它们分别与城乡人口数相乘，可以得到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估计值。^②关于政府收入的计算，宏观税负相关文献认为，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收入，^③还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④由于制度外收入尚无统一的测算结果，本文不考虑制度外收入，仅用《中国财政年鉴》中报告的国家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净收入之和来代表政府收入。

在图 3 的左半部分是作者用资金流量表和住户调查数据计算的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水平上看，资金流量表数据高出住户调查数据约 10 个百分点。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住户抽样调查未能全面反映居民部门收入水平的差异，特别是未能取得对高收入群体的有效抽样，从而低估了住户部门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资金流量表高估了劳动收入份额，从而高估了居民收入。另外，资金流量表数据的计算结果自 1996 年开始大幅下降，而住户调查

① 国家统计局计算资金流量表中政府收入的过程颇为复杂，具体可参见《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中的附件“经济普查年度前资金流量表简易编制手册”。

② 发改委研究人员采用这种方法，计算 2005 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为 44.3%。参见国家发改委：《2006 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7 年 2 月 1 日。

③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一般人们所说的“预算内收入”计为“财政收入”，这里采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的提法。

④ 关于宏观税负方面的研究已有较多研究，主要参见安体富、岳树民：《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判断及其调整》，《经济研究》1998 年第 3 期。杨斌：《宏观税收负担总水平的现状分析及策略选择》，《经济研究》1998 年第 8 期。郭庆旺、吕冰洋：《十年来税制运行的基本特征分析》，《税务研究》2004 年第 11 期。高培勇：《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涉外税务》2006 年第 6 期。闻媛：《我国宏观税收负担走势分析与政策选择》，《税务研究》2006 年第 1 期。钟明鸣：《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评析》，《税务研究》2007 年第 12 期。

数据下降幅度并不明显，一个解释是抽样调查的对象比较固定，而且拥有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难以准确反映居民部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这些差异进一步表明，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来估计非普查年份的劳动者报酬并不恰当。

图3的右半部分比较了直接用资金流量表和财政年鉴数据计算的政府收入占比。在2003年之前，两者变化的方向一致；但2003年后，财政年鉴数据仍保持大幅度上升的趋势，资金流量表数据却呈现明显波动。显然，这些事实与图2反映的情况很一致。由于资金流量表的再分配数据都直接取自财政年鉴数据，故资金流量表和财政年鉴数据在政府收入占比方面的差异，几乎全部来自初次分配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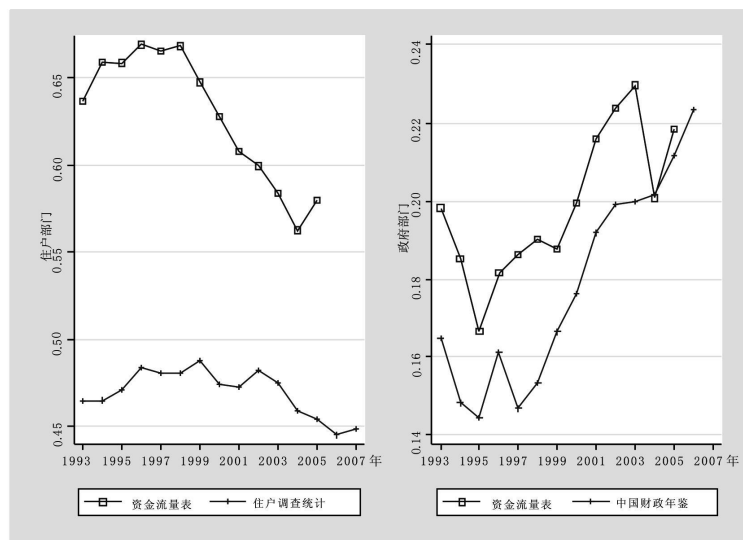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数据来源的居民和政府收入在GDP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住户调查统计”数据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计算得到，其他同图2。

(三) 资金流量表的局限性

资金流量表给出了从增加值开始，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各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形成过程。由于给出了在各分配阶段中企业、政府和住户等部门间的收支往来，资金流量表的优势是用于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此外，资金流量表还给出了各部门财产性收入数据，可用于讨论资本收入的构成（即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相对比例）的变化。

但是，资金流量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资金流量表的更新不及时，通常滞后三四年，而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其他数据，可以取得最近两年的资料。其次，受资金流量表编制过程中部分假设的影响和数据资料的限制，资金流量表在初次分配中的要素分配份额并不准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税净额，资金流量表数据在2003年之前的趋势与财政年鉴数据比较一致，但在最近两年出现异常波动；二是劳动者报酬，资金流量表采用的方法很可能高估了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并导致2005年劳动收入份额异常上升，而这些问题又进一步影响了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分配格局。

四、调整要素分配份额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本节利用资金流量表的特点和其他数据来源，对资金流量表的初次分配进行调整，并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数据更新到2007年。

（一）调整方法

前面的分析表明资金流量表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 $c_{\text{劳动}}$ ）和生产税净额占比（ $c_{\text{生产税净额}}$ ）并不准确，影响了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准确性。本节利用资金流量表和要素分配份额相关数据，对资金流量表的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整。

具体的做法如下：考虑到所有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及大部分经营性留存收入分别由居民、政府和企业部门取得，我们认为 b_{ij} 一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① 假设 b_{ij} 不受 c_i 的影响，我们考虑用较为准确的要素分配份额数据 c_i' 去替换原资金流量表中的 c_i ，再用原资金流量表中的 b_{ij} ，按式（1）—（3）重新计算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收入中的占比。

我们考虑两组 c_i' ，第一组是省际收入法 GDP 数据计算的要素分配份额。在省际收入法 GDP 中，要素收入项目中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对应表 1 中的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在替换时，令 $c_{\text{劳动者报酬}}'$ 和 $c_{\text{生产税净额}}'$ 等于省际收入法 GDP 中对应的数据，并将省际收入法 GDP 中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所占的比例分劈到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分劈比例为后两项在原资金流量表中的相对比例。

由于省际收入法 GDP 未能将部分非税收入计入生产税净额，其生产税净额的比重过低，且增幅较小（见图 2）。因此，用第一组数据调整资金流量表，无法正确反映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及其变化趋势。为此，我们考虑采用第二组 c_i' ：首先，把省际收入法 GDP 中的生产税净额占比替换为用财政年鉴数据计算的数值（见图 2）；其次，对剔除生产税净额占比的部分按第一组调整时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的相对比例进行分劈。这里假设省际收入 GDP 的各项收入中除了生产税净额被漏报外，其他项的测算是准确的，因此改变生产税净额在 GDP 中的份额，不会改变劳动收入和其他两项资本收入之间的相对比例。

注意到调整时所需要的省际收入法 GDP 和财政统计年鉴数据都提供截至 2007 年的数据。如果有 2006 年和 2007 年的 b_{ij} ，我们就可推算出这两年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占比。为此，我们在调整时用 2004 年和 2005 年的平均值来代替 2006 年和 2007 年的 b_{ij} 。^②

（二）调整后的初次分配格局

图 4 比较了调整前后各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调整前的数据是直接利用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在图中用“资金流量表”表示，第一组 c_i' 调整的结果用“调整 1”表示，第二组调整的结果用“调整 2”表示。

比较资金流量表和调整 1 的结果，调整后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图 4（1）），政府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图 4（2）），居民部门仅有微弱下降（图 4（3））。在图 2 和图 3 中，我们可以看到收入法 GDP 中生产税和劳动收入所占比重都低于资金流量表的水平，而资本收入份额则较高。另外，用表 2 可以计算得到居民收入中约 80% 来自劳动收入，20% 来自资本收入，故利用收入法 GDP 的要素分配数据后，较高的资本收入份额部分地抵消了较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收入占比的影响，又因为生产税净额和资本收入分别是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调整 1 的结果是可以理解的。

① 财产收入是一个例外，但由于它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很小，对我们的结果影响不大。

② 由于财产收入的占比很小，故这一替换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经营性留存部分（即 $b_{\text{经营性留存},j}$ ）。从表 2 中我们观察到 2004 年和 2005 年间 $b_{\text{经营性留存},j}$ 很接近，因此用这两年的平均值作为 2006 年和 2007 年的 $b_{\text{经营性留存},j}$ 比较合理。

利用第二组 c_1 调整后, 企业部门占比略低于调整 1, 但仍比资金流量表数据高, 政府部门占比高于调整 1 的结果, 与资金流量表数据更接近, 而居民部门则比其他两组数值都低。在调整时, 收入法 GDP 中的生产税净额占比被替换为较高水平的数据, 结果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同时下降, 故调整 2 的结果也很容易理解。

从各部门的变化趋势上看, 企业和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在 1995—2003 年间持续上升, 居民部门则下降, 这一趋势在调整前后的数据中得了一致地反映。但在 2003—2005 年间, 资金流量表数据波动较大, 调整后的数据则保持了与 1995 年以来一致的变化。因此, 用本文调整后的数据讨论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份额的变化趋势, 特别是近年来的变化, 显然将得到与资金流量表数据很不相同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 在调整原资金流量表的要素分配的同时, 我们还分别对 2006 年和 2007 年的数据进行了推算, 反映了最近两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在图 4 中, 两种调整方法下 2005—2007 年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收入占比都持续上升, 而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则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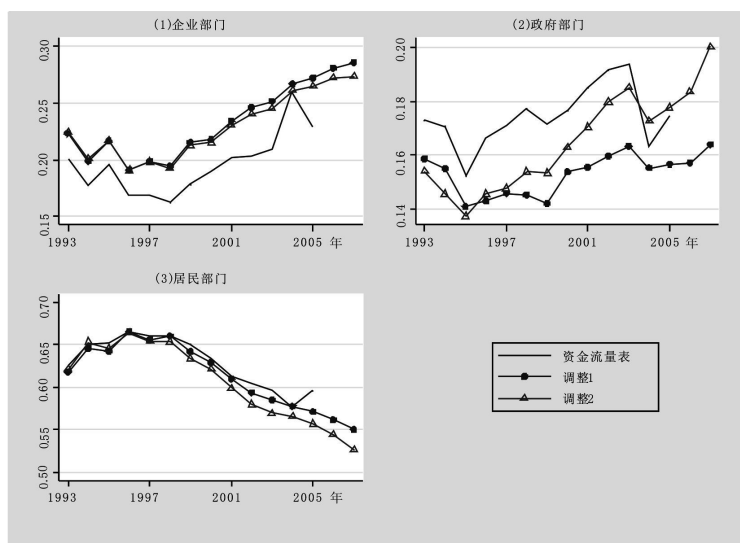


图 4 各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占比: 调整前后的比较

数据来源: “资金流量表”数据同图 2; “调整 1”和“调整 2”为作者计算。

(三) 调整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以调整后的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占比为起点, 利用表 3 中给出的再分配中的收入税、社保缴款和福利与社会补贴等项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占比, 可计算调整后的各部门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①

考虑到在第二组调整时, 利用财政年鉴数据计算生产税净额在 GDP 中的比重, 比第一组 c_1 更为准确地反映了生产税率的水平和变化趋势, 因此这里仅采用调整 2 的结果计算各部门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此外, 由于资金流量表仅更新到 2005 年, 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办法,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取得 2006 年和 2007 年的收入税、社保缴费和福利,

①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居民可支配收入 = 居民初次分配收入 - 居民缴纳的收入税 + 居民取得的社会补助; 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 = 政府初次分配收入 + 政府征收的收入税 - 政府向居民支付的社会补助 + 社会保险净收入; 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 = 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 - 企业缴纳的收入税 - 企业向居民支付的社会补助。以上各项皆指其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所占比例 (数据见表 3)。

以及社会补贴等数据，补齐了 2006 年和 2007 年的再分配项目，得以推算出 2006 年和 2007 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表 4 比较了调整前后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间的分配格局，反映了以下几个事实：第一，与原资金流量表数据相比，调整后的政府和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水平较低，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则较高；第二，调整后的政府部门占比一般低于企业部门，但调整前政府部门占比在多数年份比企业部门高；第三，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在 1996 年达到最高后，自此不断下降，但在调整前后下降幅度有差异，在 1996—2005 年间，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下降了 8.9 个百分点，而调整后为 12.72 个百分点；^① 第四，2005 年以来，调整后数据表明居民和政府收入占比分别以较快速度下降和上升，企业收入占比变化不大。

表 4 调整前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年份	居 民		企 业		政 府	
	资金流量表	调整后	资金流量表	调整后	资金流量表	调整后
1993	0.6366	0.6319	0.1745	0.1981	0.1889	0.1699
1994	0.6591	0.6611	0.1627	0.1860	0.1782	0.1529
1995	0.6587	0.6517	0.1809	0.2028	0.1603	0.1454
1996	0.6691	0.6683	0.1565	0.1780	0.1744	0.1536
1997	0.6656	0.6597	0.1561	0.1852	0.1785	0.1553
1998	0.6683	0.6615	0.1507	0.1812	0.1809	0.1573
1999	0.6476	0.6310	0.1661	0.2009	0.1863	0.1681
2000	0.6278	0.6157	0.1742	0.1997	0.1980	0.1845
2001	0.6078	0.5940	0.1819	0.2104	0.2102	0.1956
2002	0.5996	0.5741	0.1846	0.2219	0.2159	0.2041
2003	0.5842	0.5570	0.1895	0.2254	0.2263	0.2176
2004	0.5626	0.5515	0.2399	0.2415	0.1976	0.2070
2005	0.5801	0.5412	0.2052	0.2413	0.2147	0.2175
2006	—	0.5272	—	0.2457	—	0.2271
2007	—	0.5063	—	0.2463	—	0.2474

数据来源：同图 4。

五、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

1996 年到 2005 年期间，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从 66.83% 下降到 54.12%，与此同时，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从 17.80% 上升到 24.13%，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从 15.36% 上升到 21.75%。显而易见，企业和政府部门更多地享有了自 1996 年以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为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原因，我们利用资金流量表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数据，以及调整初次分配时所用的要素分配份额数据，计算了这一时期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各项收支对各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影响，结果报告在表 5 中。

表 5 表明，1996—2005 年，初次分配阶段企业部门取得的经营性留存在全国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提高了 7.49 个百分点，而在再分配阶段缴纳的收入税增加了 1.24 个百分点，因此，其可支

①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中，各部门收入占比在 2004 年发生突然变化后，2005 年又以相反的方向较大幅度地发生变化，很可能是因为 2004 年利用经济普查数据得到的结果与非普查年份的不可比，故这里选择 1996—2005 年进行讨论。

配收入总共上升了 6.33 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了 6.39 个百分点，初次分配阶段和再分配阶段的贡献分别为 50.3%和 49.7%，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在这两个阶段上升的原因分别是要素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以及再分配中收入税占比上升。

在这期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了 12.72 个百分点，其中 84%来自初次分配阶段，16%来自再分配阶段。观察表 5，无论是在初次分配阶段还是再分配阶段，所有与居民收入有关的项目的变化，都在使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减少。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社保净缴款，该项是向政府缴纳的社保缴款扣除了政府社保福利支出后的净额。在表 5 中，社保缴款占比上升了 2.05 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向居民支付的社保福利支出占比上升了 1.43 个百分点，故其净效果是使政府部门收入占比上升。

表 5 1996—2005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居民部门	
	绝对值	贡献率（%）	绝对值	贡献率（%）	绝对值	贡献率（%）
劳动者报酬	—	—	—	—	-0.0599	47.12
生产税净额	—	—	0.0324	50.74	—	
财产收入	0.0085	13.51	0.0007	1.15	-0.0303	23.83
经营性留存	0.0664	104.89	-0.0010	-1.59	-0.0168	13.25
小计：初次分配	0.0749	118.40	0.0321	50.30	-0.1071	84.19
收入税	-0.0124	-19.62	0.0211	33.08	-0.0087	6.85
社保净付款	—	—	0.0062	9.71	-0.0062	4.88
其中：社保缴款	—	—	-0.0205	—	0.0205	—
社保福利	—	—	0.0143	—	-0.0143	—
社会补助	0.0008	1.22	0.0044	6.91	-0.0052	4.08
小计：再分配	-0.0116	-18.40	0.0317	49.70	-0.0201	15.81
可支配收入	0.0633	100	0.0639	100	-0.1272	100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绝对值为各部门各类初次分配收入来源和再分配转移支付在全国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变化幅度；“贡献率”为各部门各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项目变化幅度与其可支配收入变化幅度的比值。“—”表示某部门初次分配或再分配中不存在该类收入或转移支付。

表 5 中的数据表明，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主要发生的初次分配阶段，原因是要素分配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居民部门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收入份额，在这期间下降了 5.99 个百分点。白重恩和钱震杰认为，1995 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增加等。^① 除此之外，还需强调两点：第一，要素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下降，对应着生产税净额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显然来自劳动收入份额，而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我们发现生产税净额上升 1 个百分点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0.8 个百分点左右，因此，我们判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大部分由劳动者承担。^② 第二，在测算劳动收入份额时采用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包含社会保险缴款。由于后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 1996—2005 年间上升了 2.05 个百分点（见表 5），因此剔除社保缴款后的劳动收入份额实际上在这期间下降了 8.04

①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② 中性的生产税净额指生产税净额占比的变化不改变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相对比值。当生产税为非中性时，意味着生产税净额占比的变化会更多地由某一种要素承担。关于生产税的讨论和回归结果可参考 Bai Chong-En and Qian Zhenjie, “Determinants of Labor Income Share—Evidence from China’s Provincial Data,” Tsinghua University NIFS Working Paper, 2009.

个百分点，这正是许多劳动者感到工资过低的另一个原因。

在 1996—2005 年期间，财产收入占比下降了 2.1 个百分点，原因是这一时期低利率的金融抑制政策导致存款利息减少。另外，居民部门在财产收入中所分得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见表 2）。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使这一时期居民部门取得的财产收入占比下降了 3 个百分点。财产收入是资本收入的一种形式，低利率政策一方面使得财产收入降低，另一方面降低了资金使用者的成本，资金使用者的经营性留存也随之增加。从总量来看，居民部门的储蓄通过金融中介流向企业部门，因此低利率政策导致居民部门以较低的资本价格补贴企业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财产收入占比下降实际上反映了金融抑制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我们还可利用表 5 对企业部门经营性留存占比上升的原因作进一步分析。首先，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使资本收入和生产税净额的占比分别上升。其次，在资本收入的分配中，政府部门无明显变化；居民部门取得的财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都同时较大幅度地降低；企业部门的经营性留存明显上升，而其财产收入无明显变化。因此，企业部门经营性留存上升，部分原因是其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在减少，而还有部分原因是居民部门取得的财产收入出现大幅度减少。

根据本文对 2006 年和 2007 年各部门收入占比的测算，居民收入占比在这两年继续下降。到 2007 年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下降到 50.6%，比 2005 年低了 3.48 个百分点，其中初次分配阶段下降了 3.1 个百分点；相应地，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比重分别上升了 2.3 个百分点和 0.8 个百分点。经过再分配后，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升至 24.74%，超过了企业部门。尽管主要变化仍发生在初次分配阶段，但近两年间的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与 1996—2005 年略有不同。2005 年到 2007 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 3.49 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 2.27 个百分点，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了 1.22 个百分点，略小于生产税净额的增幅，因此近两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表现为政府对居民部门的挤出。

六、总结和讨论

本文以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利用省际收入法 GDP 数据和财政收入统计数据调整了资金流量表中的要素分配结构，定量分析了 1990 年代中期以来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间的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

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1996 年达到最高（66.83%），之后持续下降，2005 年降至 54.12%，其中有 10.7 个百分点的降幅发生在初次分配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下降是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应，企业部门的经营性留存和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的占比分别增加了 6.64 个和 3.24 个百分点。通过再分配，企业部门占比有所下降，而居民部门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了 2 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则上升 3.2 个百分点。

在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中，住户部门的占比都有所下降，这对制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有指导意义。首先，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度下降。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资本收入份额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① 由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接近 1，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提高劳动力价格将刺激资本替代劳动，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不大，

① 最近研究者发现产业结构转型是中国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 年第 3 期；李稻葵、刘霖林、王红岭：《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 期。

反而会扭曲劳动力市场,从长期来看可能造成失业率上升,得不偿失。生产税净额的上升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资本收入下降,因此提高生产税率的成本主要由劳动者承担,而降低生产税率则更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①除此之外,由于统计劳动者报酬时未剔除社保缴款,而社保缴款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上升较快,故劳动收入占比的实际降幅应比本文测算的结果更大,因此调整社保缴款的比重和方式,是增加劳动者报酬比重的一个可行办法。

其次,财产收入下降是使居民在初次分配阶段收入占比下降的另一重要原因。1996—2005年,半年期平均贷款利率从9.72%降到5.22%,平均存款利率从7.2%降到2.07%,并在近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利率大幅下降的直接后果是使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相应降低。从总量上看,居民部门是企业部门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过低的存款利率一方面降低了居民部门的财产收入占比,另一方面也使企业的资金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实际上就是居民部门变相补贴企业部门。许多研究曾从不同角度讨论金融抑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强调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②本文测算结果表明,金融抑制也会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再次,再分配阶段不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以收入税为例,尽管居民支付的收入税在近年来不断上升,但即使是在最高的2007年,也仅占国民收入1.28个百分点,因此即使免除居民部门所有收入税,也无法大幅度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在社会补助方面的支出并未随经济同步增长,因此在未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中,政府至少应以更大的幅度提高对低收入家庭、残障人士、孤寡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支出。

最后,我们的计算表明,在1996年到2005年期间政府部门占比上升了6.39个百分点,占居民部门降幅的50%。这似乎意味着政府正在挤占居民收入。但在给出这一断言时,我们需要考虑两方面的事实。一是从OECD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看,政府收入一般都高于企业部门,^③但本文的计算发现我国企业部门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高于政府收入,仅在2007年首度超过企业部门,故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更突出的问题很可能是企业部门收入占比过高;二是政府收入占比的水平,即宏观税负,与一国的税制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宏观税负水平提高也可能是经济结构转型及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④因此,关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上升是否合理,还需对其成因和影响作更全面的讨论。

〔责任编辑:梁 华〕

① Bai Chong-En and Qian Zhenjie, "Determinants of Labor Income Share—Evidence from China's Provincial Data," 2009.

② 例如 Bai Chong-En, D. D. Li, Y. Qian and Y. Wang, "Anonymous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How Does China's Reform Limit Government Predation without Reducing Its Revenu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of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99014, 1999; Qian, Y.,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2001; Allen, Franklin, Jun Qian and Meijun Qia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77, no. 1, 2006, pp. 57-116; Wendy, Dobson, K. Kashyap Anil, Lardy Nicholas and H. Summers Lawrence, "The Contradiction in China's Gradualist Banking Reform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2, 2006, pp. 103-148; Brandt and Zhu, "The Chinese Banking Sector: Problems and Solutions,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FX and Capital Markets Policies for the Coming Decade," 2007.

③ 张东生等编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08》,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④ 参见李绍荣、耿莹:《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justice. Since the rational choice model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Kantian *a priori* approach, the two different formal approaches fail to provide substantive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equity.

(2) The Carbon Budget Scheme :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a Fair and Sustainable World Climate Regime

PanJiahua and Chen Ying ° 83 °

Consensus o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s been reached at the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level. However, as the issue involves economic costs and the right to develop,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s consistently failed to balance the demands of imparti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However, a sustainable carbon budget scheme is undoubtedly achievable if the global carbon budget (the total amount of permitted by climate security) is made an absolute constraint. If a preliminary distribution was made among the world's population on a per capita basis, the total limited global carbon budget could not only meet basic needs but also ensure the scheme's fairness. Taking into account historical emission levels and future needs, we should carry out carbon budget transfer payments and devise a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mechanism to ensure efficient allocation under the scheme. Unlike the phase-by-phase progress and provisional goals of the Kyoto Protocol, the carbon budget scheme outlined above is a comprehensive and holistic package. Due to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however, many technical issues can only be worked out throug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3) Who Has Eroded Residents' Incomes? An Analysis of China's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s

Bai Chong'en and Qian Zhenjie ° 99 °

On the basis of the revised table of capital flows from the 2004 economic census, the authors conducted an analysis of the pattern of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among the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resident sectors during the period 1992-2005. They found that the share of disposable income going to residents peaked in 1996 and then started to fall. By the end of 2005, it had fallen by 12.13%. At the stage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the share of disposable income going to residents fell by 10.12% while that going to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rose by 7.63% and 2.49% respectively. At the stage of re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the share of disposable income going to residents and business fell by 2.01% and 1.16% respectively while that of government rose by 3.17%. I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the share of residents' wages and property-based income saw a decline of 5.55% and 2.97% respectively. During 2005-2007, there was a further 3% decline in the resident sector's share of disposable income due to the increased share of net producer tax in primary income distribution.

(4) Behavioral Maximization in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A New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Behavioral Rationalism

He Da'an ° 116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issues of the psychology, motive and aim of parties to a trans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uncertain market conditions. The paradigm proposed, that of behavioral maximization,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it runs throughout the entire transaction process and thus describes behavioral rationality in a way that adheres more closely to reality. The paper first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utility function, showing that most current theories on economic policy-making are to a greater or